



复旦智库报告
FUDAN REPORT SERIES

2019 NO.02

上海系列
SHANGHAI OBSERVE

市场与政府双向互动推动更高质量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To Boost Yangtze River Delta Integration : the two-way interaction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市场与政府双向互动推动更高质量 一体化发展

——关于长三角深度一体化的几点思考

复旦发展研究院

2019年5月

目 录

一、长三角深度一体化的定位和目标	1
1. 长三角一体化多年的经验	1
2. 长三角深度一体化的定位	1
3. 长三角深度一体化的目标	2
二、长三角深度一体化的路径	2
1. 长三角深度一体化的基本思路是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配置作用	2
2. 长三角深度一体化的根本保障在于行政管理体制互动合作	4
3. 长三角深度一体化的主要抓手是市场主导的产业自然集聚和分工，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融合，生态经济与工业经济的融合	4
4. 长三角深度一体化的基本前提是人民获得感的不断提升	7
5. 长三角深度一体化不要忽视城乡一体化	11
三、关于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建设的几点思考	12
1. 示范区建设要紧密围绕建设“世界级大都市圈”这个总目标	12
2. 示范区建设要紧密遵循“先进制造业”这一宽路径	12
3. 示范区建设要做好“产学研用结合”这篇大文章	13
四、上海要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中发挥核心引领作用	14
1. 上海要在能力建设方面引领前沿	14
2. 上海要在生态建设方面持续深入	14
3. 上海要在文化建设方面有所突破	15
4. 上海要在人才集聚方面创新思路	15
5. 结合国家战略需求，完善“一带”、“一轴”、“三区”空间构想	16
五、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可能面临的挑战	16

一、长三角深度一体化的定位和目标

1. 长三角一体化多年的经验

过去四十年，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释放了改革开放的巨大动能。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长三角一体化逐渐成为江浙沪皖三省一市的共识，其中上海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激发了整个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潜能。与其他区域经济不同，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市场与政府的力量始终相辅相成，市场的力量是根本性的，政府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这也直接决定了过去几轮探索中，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使经济活动的内在关系得以自然联结，由之带来区域经济的融合和活力的喷发。

2. 长三角深度一体化的定位

当前，中国改革发展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成为全局性的共识。面对日益激烈和尖锐的国际斗争，面对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严峻挑战，中国经济迫切需要新的引擎。作为数百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龙头，长三角一体化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国家使命，这一使命不是简单的经济结构优化重组，也不是简单的行政管理权限调整或是行政区划变更，而是立足于世界经济科技前沿和国家发展需求，在前所未有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新探索，将这一区域打造为太平洋西岸的世界级发展极，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同“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及未来可能的中西部区域发展极相互配合，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

3. 长三角深度一体化的目标

长三角深度一体化应注重发挥好市场、科技、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动能，注重江浙沪皖乃至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充分利用“内外兼修”（深具潜力的国内市场和面向全球的海外市场）的双扇面辐射优势，实现区域能级跃升，构建江海联结、辐射江海的大区，从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的“桥头堡”转变为中国引领全球发展的“领跑者”，从齐头并进、并联发展的经济联合体转变为同舟共济、串联奋进的世界级经济中心。

二、长三角深度一体化的路径

1. 长三角深度一体化的基本思路是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配置作用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动权在企业而不是政府。从国际国内经验来看，统一市场的形成，必须依靠企业的自主选择和作用，政府应该制订顺应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政策，遵循市场规律，做好各类服务平台建设，“顺其自然”地尊重企业的发展选择。

（1）建构统一的市场标准

资本合作和互联互通，基础在共同的市场体系和规则。我们建议，长三角深度一体化应与自贸区扩容紧密结合，以“长三角自贸区”为建设目标，建构跨区域的管理机构，发挥现有自贸区的溢出效应、辐射效应，让自贸区的政策、标准惠及更广大的地区，进而将三省一市的自贸区连成一片，最终形成规模大、质量高的长三角自贸区。目前可以先行试点的，是可以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复制推广至整个长三角地区，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负责监管，探索长三角地区境内外本

外币融资、人民币跨境使用和资本跨境流动的一体化和更高的便利化。

(2) 建构统一的服务平台

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作用发挥在于服务。我们建议，根据各地优势，成立各类专业化、跨区域的长三角共享服务平台，在法律法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企业融资和合作、运输物流等方面为企业提供服务。目前可以先行试点的，是在长三角通关一体化的基础上，推进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标准化建设和互联互通，建设一体化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大平台。

(3) 建构统一的数据平台

信息时代条件下，政府对经济的宏观治理往往体现在数据掌控的精准性和即时性上。我们建议，长三角深度一体化，可以从共建统一的经济社会数据平台着手，三省一市统合数据资源，形成统一的经济社会数据统计平台、发布平台和分析平台。

(4) 建构统一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

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长三角地区金融体系特别发达、金融活动特别活跃，金融服务深度一体化进程是市场的必然选择。建立统一的金融风险防范和预测预警机制，是基于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的必然选择，三省一市已经有很多地方建立起类似的平台，亟需统筹形成互联互通的机制，以保障长三角深度一体化的金融安全。具体做法如建立长三角地区银行业机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建立《长三角地区金融稳定报告》等风险信息公布制度，建立应对金融市场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机制和处置预案等。

2. 长三角深度一体化的根本保障在于行政管理体制互动合作

从历史来看，即使区域一体化是市场的内在需求，但政府的作用依然不可或缺，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后，从中央到地方、从宏观到微观、从长期到短期，都应有相应的制度设计。各级政府要坚持稳中求进，坚持问题导向，把《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各项任务分解落实，明确责任主体，增强一体化意识，加强各领域互动合作。建议设置长三角一体化基金，政府、企业等机构合力，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在长三角一体化基金的形成机制方面，按照“股权分摊、责任平摊、市场运营、优化配置”的原则，由各省入股设置并委派专人管理，引入国资平台、大型民企、国家级开发机构等，形成合力，并保障监督。在基金运作方面则是以母基金撬动更多国内外长期机构投资者设立各专项投资基金，如基础设施发展基金、产业发展基金、科创基金等，以产业或功能导向，来配置资金和资源，遵循市场规律，实现整个区域的资源优化配置。从长远来看，可以在长三角一体化基金框架下，探索地方政府间财政收支分享分摊的合理体制机制安排，尝试构建长三角政府间横向转移支付机制，力争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有差异的地区实现均衡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成功经验。

3. 长三角深度一体化的主要抓手是市场主导的产业自然集聚和分工，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融合，生态经济与工业经济的融合

(1) 推动产业集聚和分工

长江三角洲各地要素禀赋不同、已有产业集聚不同，继而形成的分工不同。如上海人才集聚，融资环境好，形成了一批中小科创企业；但我们调研发现由于

上海建设用地稀缺、人工成本较高，或者产业在上海集聚度不高，这些中小科创企业在规模化产业化时需要去江浙，逐步形成了服务与研发在上海、制造在江浙的资源互补形态。在这一方面，三省一市需要做好引导和协调工作，建立跨地区的产业沟通平台，帮助企业与长三角各地方政府接洽，如举办长三角产业投资论坛，给政府招商引资搭建平台，同时，要注意统筹协调，梳理各自优势，避免重复竞争。

(2) 生态经济与工业经济的融合

不搞大开发、共抓大保护，是习总书记对包括长三角三省一市在内的长江经济带沿线提出的总要求。这对长三角一体化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这也可能成为长三角经济发展模式的最本质特征：即用产业创新推动新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把握世界先进制造业的产业链高端，发展附加价值高收益大的环节，从而根本上改变发展方式，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三省一市要优化产业布局，共建严格环境准入、治理协调机制，严格控制和治理长三角水污染，划出开发利用红线，生态环境优先和不搞大开发，集中规范布局重化工业产业园，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改变沿江重化工业分散布局、污染转移和环境风险聚集难以管控的局面。建立全覆盖生态环境风险预警，大幅度降低生态环境风险。同时，建立高水平的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环境监测网络，联手严防突发生态与环境重大事件。

科技创新一体化是长三角生态环境治理一体化的根本途径。我们要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强化区域合作关系、诱导企业创新等多种市场一体化路径，影响长三角区域要素资源配置，整合三省一市相关产业发展政策，鼓励新技术产生。如建立区域内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共同标准，制定鼓励新能源汽车在区域内的优惠

政策；加强长三角核心技术的联合攻关，发挥区域内高校、科研院所的技术力量，共同开发新能源相关技术等。

(3) 瞄准若干前沿领域，打造核心产业集群

一是着力打造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智能产业生态圈。我们建议，以沪嘉苏的铁三角为智能产业先导基地、六大走廊为智能产业辐射区、杭州湾和通州湾为智能经济发展区的机器智能产业集群。通过实施“技术-产业-资本”一体化、“高校-企业-政府”一体化的三螺旋创业体制，民间和政府形成合力。让机器智能产业成为拉动中国新经济的引擎，到 2025 年，形成六条走廊智能产业带、八大智能产业集聚区，实现 1.5 万亿 GDP，成为长三角的重要的经济增长极。

二是着力打造微电子产业集聚区。长三角是中国集成电路企业最聚集、产业链最完整和技术力量最强的地区，引领我国集成电路研发与产业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人才总量不足、领军人才缺乏、人才结构不合理，并且急缺具备工程实践能力、能够解决工程应用问题的工程型、创新型人才。我们建议，利用长三角一体化契机，联合长三角地区 IC 龙头企业，深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引领集成电路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和企业孵化，全面提升产业急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公共基地产业支撑能力。联合长三角电子学科优势的高等学校，形成联盟，打造全球微电子学科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高地。

三是打造健康科技集群。基于长三角坚实的健康科研和生物医药基础，加强医学研究联合攻关，打破机构限制和管理壁垒，推动优势研究力量的整合和集中，协同开展高质量多中心临床研究、联合突破关键技术等；聚焦高发病率、高患病率、高致残率和高死亡率重大疾病，开展符合国际规范的多中心临床研究，建立高质量的临床研究数据库，形成一批规范化可推广的临床指南、标准或专家共

识。推动公立、民营医院与医药科技园区、医药企业合作，建设创新药品、医疗器械示范应用基地和培训中心，形成“示范应用-临床评价-技术创新-辐射推广”的良性循环；完善健康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利用一体化契机下放高校和科研院所健康科技成果的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争取支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普惠税制等在一体化示范区先行先试；促进健康科技中介服务集群化发展，重点支持和大力发展健康研究开发、技术转移、检验检测认证、创业孵化、知识产权、科技咨询、科技金融等专业技术服务和综合科技服务；在示范区建设涵盖生命医学研究、开发、制造、服务的科研院所、企业、医疗机构、产业园区、行业协会等组成的科技园区，探索打造以基础研究、临床应用研究、成果转化研究链为主线的医学协同创新集群，加强集群内部各科研机构协同合作，同时形成各创新集群间的跨学科合作机制；积极吸纳医药协会、医药产业集群的优质资源和高质量科技研发人员进入集群，构建与强化协作创新机制，完成区域内健康医学学科与产业发展的“大协同”。

4. 长三角深度一体化的基本前提是人民获得感的不断提升

(1) 从顶层设计入手，建立起有利于实现社保一体化的成本共担、利益共享的协调和补偿机制

从政策设计层面有效推进区域社保一体化，可以借鉴欧盟一体化经验，通过“养老权益累计+待遇分段发放”方案进行养老保险制度上的改革创新。在不改变现有养老保险统筹层次的前提下，将劳动者在各工作地的养老保险权益累积计算。流动人口在转移本人养老保险时，可以考虑逐步将个人账户和统筹账户分开，个人账户随人转移，统筹部分在原工作地保存记录。待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各地根据参保人员的参保记录，以集中或分散方式向其支付养老保险待遇。

此方案能使劳动者在不同时期形成的养老保险权益都能得到承认，减少流动人口养老保险权益的损失，同时不影响当地政府养老保险制度的根本利益，可以规避各转入转出地因自身利益设置的转接障碍，有效化解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利益冲突。

(2) 根据长三角区域各地老龄化的严峻性程度和所处阶段不同的实际，推动养老区域融合发展

一是整合长三角地区养老资源，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对长三角地区现有养老资源进行全面梳理，对现有养老资源进行系统整合，从地域、服务对象、服务需求、文化层次等方面区分出不同老龄群体的不同养老需求，对养老资源进行有针对性的统一布局与调整。二是建立长三角区域养老信息化平台，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为养老一体化提供数据支撑，为差异化的养老提供精准、高效率和高质量的服务。三是不断加强政策协同，引导三地有关部门协调联动，梳理、修改和调整相关政策以确保养老一体化的顺利推进。在养老项目、发挥资金、资源配备及相关软硬件建设上的支持作用，吸引更多社会力量投入养老事业发展。四是养老产业发展的区域标准。首先，统一养老服务行业标准，包括准入标准、养老产品标准化、养老服务职业化、养老护理标准化等。这不仅能促进养老产业的健康、良性发展，而且还能为老年人在考虑异地养老时提供更多的选择。其次，建立养老服务人才合作培养机制。根据长三角各地区的资源禀赋，建议上海凭借其教育资源优势重点培养高端养老服务管理人才，江浙地区结合其职业教育资源大力培育和储备养老护理人才，安徽以输送养老服务人力资源为主。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会对现有医疗服务与保障体系提出挑战，可以积极稳妥地探索新模式

一是实现电子病例与健康档案的共建共享。对于一体化区域内人口建立统一电子病例与健康档案就尤为重要，这在信息化支撑下将有望实现。二是加快区域医疗保险管理的互联互通。医疗保险的属地化管理模式是当前跨区域就诊的主障碍，而对于该种管理模式的突破面临着极大的阻力，但是并不妨碍进行新模式的探索，比如为部分频繁流动的商务人群建立“长三角医保基金”。三是构建横向区域协同与纵向分级诊疗体系。加强与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是推进基层首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有序有效分级诊疗的重要抓手，借助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对差异化的诊疗需求进行精准识别，进而为患者提供优化的医疗资源匹配建议。四是完善政府托底下的市场准入与监管机制。医疗资源的挤压与服务供给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市场来解决。市场资本的进入本身是对于医疗需求多元化的回应。而政府在托底的基础上，应当扶持龙头企业的发展、完善市场准入与监管机制。

(4) 积极配合推进铁路、公路、港口、机场、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区域资源优化配置，构建设施互联互通、管理协同合作、服务共享共赢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从航空来说，依托浦东国际机场卫星厅建设和第三航站楼筹建，进一步提升浦东国际机场作为枢纽型机场的服务能级，拓展浦东机场面向长三角、面向全球的辐射功能。参与建立长三角区域机场常态化多层次交流机制，在航班备降、应急救援、信息共享等方面加大合作力度，协力打造长三角世界级机场群。

就铁路而言，依托沪通铁路及上海东站枢纽建设，建立浦东机场、外高桥港

区、洋山港区构建空铁联运、海铁联运新格局。支持洋山港、外高桥港与长三角港口的联合运输、江海联运等领域合作。

就轨交和路政而言，优化完善市域轨道交通网络，加快建设虹桥-浦东机场联络线，实现“两场三站”重大对外交通基础设施间的互联互通，提升城市整体服务水平和对外辐射能力。促进长三角地区构建高速公路网、城际轨道网、内河航运网等复式快速通道与多式联运体系。以打造高效便捷的区域集疏运体系为目标，建设外高桥、临港集卡服务中心，推进港区、机场区域、铁路枢纽等地区的配套路网建设。

在交通领域可以探索几方面机制创新。一是建立区域交通建设与运营投融资平台，遵循权责利一致原则，由三省一市按照各自需求和经济实力协商出资比例。鼓励在沪金融机构设计定向类金融产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引导市场资金进入，共享政策红利和发展果实。二是以沪通铁路等跨行政区域重大工程为试点，研究区域 TOD 开发模式。组建统一动迁、收储、投资、建设、周边开发的联合公司，尝试异地动迁安置、占用农地指标异地平衡、建设用地指标区域协调、补偿开发土地指标区域分配等办法，充分运用长三角腹地广阔的优势，有重点、有梯度的做好大交通建设。

（5）在生态服务方面，以安全的水源地和生态空间的维护为共同目标，明确各方的责任义务，共同保护，共同享用

总体而言，在环境治理体制机制上要推动一体化，统一制度内容和执法标准，建立区域内统一的生态环境治理机构，实现统一行动、统一监管和统一管理。要建立长江流域和长三角生态环境保护联动机制，率先在三角洲城市群之间建立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审计和问责制。

具体来看，一是划定长三角地区共同水源地，形成费用分摊机制，共同保护；二是以环太湖区域生态修复和长江口水生态修复为核心，和谐江湖关系，优化岸线利用，聚焦生境保护与修复，统一排放标准，实现联防联控；三是重点加强交界区域森林、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对于长三角区域内经济相对落后的区域，要严格进行生态保护，可以考虑探讨区域内的生态补偿制度；四是进一步处理好长三角城市群发展与长江大保护之间的关系。要科学认清长江是长三角城市群命脉，长江三角洲是长江有效保护的关键地区之一。在流域尺度上要协调好长江大保护与长三角城市群的关系，承担起大保护的责任。在长三角范围内，按照长三角自然特征及各城市的经济社会功能，优化与调整好国土利用格局；划定一体化的生态红线，留足一体化的生态空间。同时，强化省际统筹、区内外与城市间联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确保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生态功能不降低。五是联合建设自然保护地网络体系和加大环境保护联动的力度。对长三角自然保护地网络体系进行科学规划与同步建设；增强自然保护地的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实施跨行政区域的重大生态修复工程，特别是河流、湖泊和滩涂湿地生态系统的水生态、水环境和水管理；重点解决在长三角城市群有共性的损害群众健康的环境问题，确保民众利益，如自来水质量、大气污染和食品安全等。

5. 长三角深度一体化不要忽视城乡一体化

长三角三省一市，某种程度上来说城市化程度相对较高，但仍然有广大的乡村地区，也有数量不少的贫困地区。长三角深度一体化不仅仅是推动大都市圈的形成，还包含了“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的内容。在各类规划和行动中，我们要主动把相关内容纳入进来，推动对贫困乡村的对口帮扶，在形成统一市场过程中要推动这些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这也是一项极其重要而容易被忽视的工作。

三、关于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建设的几点思考

1. 示范区建设要紧密围绕建设“世界级大都市圈”这个总目标

四十年城市化发展到今天，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化密度已经全球第一，按照历史和市场规律，建设世界级大都市圈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这个都市圈怎么捏合在一起，在示范区里可以做很好的尝试：我们要对标世界级的基础设施体系，探索设立三省分摊的基础建设基金，引入市场化的方式，探索解决土地流转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运营和监督等问题，再加上率先覆盖 5G 网络等举措，打造世界级的交通和通讯环境；我们要对标世界级的区域功能服务供给能力，在示范区内实行贸易投资便利化、医疗教育一体化、生态环境同质化、行政管理单一化的治理服务体系，甚至可以考虑给予示范区“自贸区”或“准自贸区”待遇，在财税收入方面上海可以让点利或者商讨合理的财税补偿机制，打造区域一体化治理的全球示范区；我们要对标世界级的高端资源空间聚集能力，探索并实现示范区统一规划、统一布局、统一集聚；我们要对标世界的空间经济密度，引入和扶植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别是面向未来 50-100 年的前沿产业，与示范区的自然环境结合，打造工业经济与生态经济结合全球新经济标杆；我们要对标世界的科技创新能力，与引入产业结合，把江浙沪皖的一流高校的前沿科研机构引入区内，打造科技创新产业化航母。总体而言，示范区必须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尽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政策和经验，也必须交出一份在产业、生态、民生方面让全国满意的答卷。

2. 示范区建设要紧密遵循“先进制造业”这一宽路径

目前为止，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基本囊括了战略新兴产业的七大类别，总体

规模较大、发展前景好但在全球处于中低端、转型升级难度大，这是我们的现状，总体上不能适应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对标美国、日本、德国等先进制造业大国，长三角的任务是明确的、压力是显著的，同样以示范区为例，我们要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增长极，已有基础良好的引领性产业，如人工智能、微电子、生物医药等，要在示范区形成规模效应，且与现在已有的形成差异化，这需要我们在规划布局、行政服务、产业链分工等方面尽快做好顶层设计。包括与科创板等结合起来，在示范区形成真正的前沿产业示范，为“中国智造”建出一个新高地来。

3. 示范区建设要做好“产学研用结合”这篇大文章

长三角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与能否构建与之紧密联动的科技创新体系密切相关。现在长三角三省一市的科技创新，上海的全球科创中心、浙江的互联网、江苏的物联网、安徽的国家综合科技中心，各具鲜明特色、各有千秋，“一体化”不仅是外在的动力也是互补的内在需求。示范区恰在区域腹地，汇聚四方科创成果可谓正当其时、正当其地。现在上海浙江已经形成了一条 G60 创新走廊，在示范区的范围内大体可以青浦-嘉善往南辐射，受这个思路启发，我们大胆设想，青浦-吴江一线向北向西拓展，与南京、合肥对接，形成一条“长江下游创新走廊（带）”，这在空间上可行的，在实践中是易行的，如能形成这样两大走廊，把复旦、交大、同济、南大、浙大、中科大等高校的顶尖科技创新资源汇聚成片，完全可以预期其引领作用和对辐射区域的带动作用，而示范区届时既是原点，也是节点。

四、上海要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中发挥核心引领作用

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中，上海拥有的地理优势、资源优势、金融优势、制度优势、国际化优势等都是毋庸置疑的。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中，上海要体现高度，发挥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作用，形成资源高差带动市场主体的流动，促进长三角进行合理的分工，错位竞争、协同发展，共同互补；上海要体现创新度，发挥全球科创中心的作用，借助自贸区、科创板等政策资源充分调动长三角创新和产业动能，强化创新驱动、加强生态联合治理、共建基础设施、突出先行先试；上海要体现包容度，立足全球和全中国，树立以上海为核心辐射整个长三角区的“大上海”视野，舍得牺牲、舍得奉献，做好引领、当好表率。

1. 上海要在能力建设方面引领前沿

我们要抓住信息革命和中国建设网络强国的历史机遇，把上海打造成新技术、新业态与新治理、新教育相结合的战略信息枢纽，打造世界级总部经济集聚城市、平台经济集聚城市和科创产业集聚城市。简单概括起来，就是打造上海制造业新形态：以长三角智能硬件制造中心、集成电路产业基地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以区块链技术、类脑人工智能、大数据应用为突破口的颠覆性技术转移链，以各类知识溢出而形成的科技园区、科技小镇、科创走廊等创新集聚区，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先进算法为依托的超大城市网络理政新样态。

2. 上海要在生态建设方面持续深入

我们要通过我们现有的“长江经济带智库合作联盟”等平台，“量身定制”为解决长江流域资源环境与生态重大问题提供涵盖“立法、规划、评估、预警、防范、解决”全逻辑链的方案，为解决全球共有的生态治理难题提供“中国智慧”，

增强中国对全球生态治理的领导力。推进健康上海建设，我们还要构建与国际化大都市定位相匹配的多元、多层次医疗健康服务体系、研究体系、产业体系，推动上海优势研究力量的整合和集中。

3. 上海要在文化建设方面有所突破

我们要促进、保护和弘扬在上海涌现的、与新时代相符的现代化精神，助力改革开放持续深化。面向全球的开放观是这种新海派文化最显著特色之一，立足“一带一路”桥头堡的上海，要通过推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总部落地，用足金砖、自贸等概念，勇敢拥抱全球，把国家对外战略与城市软实力紧密结合起来；乐于奉献和服务是这种新海派文化最核心的本质之一，投身精准扶贫的上海，要着力推进“共享”、“共进”与“共富”，让上海的胸怀成为一种共同的精神。

4. 上海要在人才集聚方面创新思路

上海亟待建立以优化人口流动为核心特征的动态性的人才体系。支撑城市的人才集群必须是全覆盖和成体系的，只有安稳扎根的高质量白领、灰领，以及能够提供全方位服务的“蓝领”良性共生，才能真正追求卓越。为此，需要完成高端国际国内人才的有效引进，高质量大学生的有效吸引和使用，高素质劳动者队伍的有效建设这三项战略任务。我们还可以探索构建“虚拟人口”，即依托现代通信技术等，建设一支远距离为上海贡献力量的人才队伍，这也是我们实行“开放战略”的应有之义。而面对老龄人口，借长三角一体化之机，参考国外成熟经验，则可采取周边异地养老、建设健康养老小镇等方式，形成人口良性流动机制，破解人才难题。

5. 结合国家战略需求，完善“一带”、“一轴”、“三区”空间构想

“一带”，即推动长江经济带沿线区域的协同发展，不断加强对“负面清单”推行规律的研究，主动减少不利于区域整合的行政限制，更可以考虑放大“自贸港”概念，牵头组建跨省市区的自贸港群，强化改革创新联动和辐射带动作用；“一轴”则是与粤港澳衔接，打造沪港金融轴，即借助香港的国际化合作优势，建立上海金融企业的国际联系和能力，提升上海金融的国际化能力；“三区”，则是重点打造杭州湾沿岸高端产业区、沪杭高速公路走廊高科技小镇集群和长江口北岸休闲养生区。

五、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可能面临的挑战

纵观历史，任何改革创新不可避免地面临着风险与挑战。长三角一体化可能面临的挑战是全方位的，如市场体系统一化对现行财税体系的冲击，自贸区扩容对非自贸区域的冲击，一体化进程加速后核心城市某些产业集群的迅速外溢与经济增速放缓，统一市场形成初期区内市场资源高地可能发生的“虹吸”现象，基建合作、资源利用等补偿机制的确立，区内人民群众的医疗教育需求向中心城市迅速集聚，以及本文已经提到了的长三角的城乡一体化问题等。以上这些问题只是学者研究和经济实践的“冰山一角”，具体还有待更进一步的研究。但是，一旦我们解决好了这些问题，一个全新的庞大的高质量经济体必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强劲的动力来源，也将成为我国引领新一轮全球竞争的底气所在。